

论公共性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从帝国主义理论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谈 谭¹, 叶 江²

(1. 上海政法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 上海 201701;

2.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全球治理研究所, 上海 200233)

[摘要]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及其发展演变的重要理论框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帝国主义理论相应地经历了经典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冷战后新帝国主义等理论类型的演进。三类帝国主义理论尽管解释力各有差别,但它们都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和全球性问题的根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种被资本霸权控制的体系,而且这一体系违背了人类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偏离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性要求。因此,必须探索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公共性且有助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体系和共同体实践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体公共利益为基础、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以维护和增进共同体公共性为价值指引,旨在让资本增殖的逻辑服务于增进和实现共同体的公共性,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构建一个多极、平衡、公正的全球秩序,由此实现公共性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关键词]帝国主义;资本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逻辑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12.007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资本推动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但是,由资本推动并形成的现代世界体系正面临各种矛盾和危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1]这意味着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或国际秩序已难以为继,必须变革,因为“公共性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属性和要求”,^[2]而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偏离了

公共性尤其是人类社会共同体公共性的要求,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个共同体的要求。^[3]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4]“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5]换言之,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新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当前,国际社会行为体的任务就是用共同

作者简介:谈谭,历史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叶江,法学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研究员。

体公共性逻辑来超越资本逻辑的主导地位,让资本增殖的逻辑服务于增进和实现共同体的公共性——人类社会的公共利益。

一、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帝国主义理论演进及其内涵

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及其发展演变的重要理论框架。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特征,帝国主义理论也呈现出阶段性的演进,即出现经典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冷战后新帝国主义等三大理论类型。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是列宁和一战前后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超级大国帝国主义是英国学者亚历克斯·卡里尼克斯(Alex Callinicos)提出的,主要是指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的“开放帝国主义”(open door imperialism);^[6]冷战后出现的各种新帝国主义理论可以归类为三种范式——超级帝国主义、霸权帝国主义和晚期帝国主义。^[7]在整个帝国主义时期,资本逻辑既体现为“一种历史进步,使得人类社会生产力、人类文明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又内含超越自身界限的“无限增殖欲望”,导致了一系列危机,“对人类生存发展产生整体性、连锁型反应”。^[8]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资本逻辑及其后果,需要我们梳理和分析帝国主义理论演进及其内涵,深化认识当今全球治理困境和国际局势动荡的根源。

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中“帝国”和“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存在“泛化倾向”。^[9]早在1915年,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就批评把“一般的征服政策作为帝国主义的定义”,因为这样做是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与西班牙征服者”“古代罗马与现代美国”相提并论,而“统治阶级的一切政策都有特定的职能。在一定的生产制度基础上产生的政策,其职能就是促进该种生产关系的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封建统治者的政策就是要加强和扩大封建的生产关系”。^[10]卡里尼克斯指出,在欧洲封建时代,封建

统治者的政策主要围绕国家间军事扩张过程中的地缘政治竞争,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各国政府竭力为其本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服务。“(当这)两种不同的竞争形式——资本间的经济竞争与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一旦融合在一起就会产生现代帝国主义。”换言之,帝国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这两种逻辑融合的产物”。^[11]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其《新帝国主义》一书中讨论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实际上是反过来将已经融合在一起的两种逻辑分别加以剖析。^[12]同样,加拿大学者埃伦·伍德(Ellen Wood)在讨论冷战后全球化条件下美国主导的资本帝国主义特征时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强制”与“超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全球化的政治形式不是一个全球的政权而是一个‘多国’的全球系统,而‘新帝国主义’正是在资本不断扩张其经济势力,但维持这种势力的超经济力量却日益受到限制这样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中得以形成的。”^[13]正如列宁所说的,在揭示帝国主义特征和本质时,关键是不能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14]当然,不同的帝国主义理论在解释帝国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其理论框架和结论也有差别。

(一)资本扩张、积累、竞争——经典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演进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布哈林、列宁甚至包括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等都被人们称为“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理解国际关系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家”,这一代理理论家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将自己的著作视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续篇,即继续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后动因的努力”。^[15]第一代理理论家们都曾用自己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考察和解释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并试图论证人类社会摆脱资本主义困境的方法。

希法亭1909年底写作完成《金融资本》,其

中他详尽地考察了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他认为,金融资本是“归银行支配的和由产业资本家使用的资本”。^[16]“金融资本所希望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它需要的是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能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以便能把整个世界转变为自己金融资本的投资场所。……因此,没有任何限制的强权政治便成了金融资本主义的要求。”换言之,不同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欲求的不是自由竞争而是控制,它们将扩展至自身金融权力能获利的任何地方,因而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领土扩张、关税保护等。希法亭指出:“(金融资本)对扩张的要求也使资产阶级的整个世界观彻底变革了”——“和平理想失去了光泽,代替人道理念的是国家强大的理想,……民族(平等和独立)思想转化为把本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思想。”易言之,金融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将导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催生强权政治和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体系”,它幻想“征服世界”。^[17]用考茨基解释希法亭的话来说,就是“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偏爱的政策”。^[18]尽管希法亭的主要兴趣是在金融资本的兴起及其趋势上,但他论及的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国内和国家间政治的后果,尤其是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将走向对抗和冲突,某种程度上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不同于希法亭,卢森堡在她的《资本积累论》中从经典剩余价值理论出发提出了“资本主义环境—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国际经济关系模型,这个模型是后来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理论雏形。从“资本积累的扩大再生产”角度,卢森堡提出了一套“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在她看来,由于资本不断追求增殖的本性,“为资本积累而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19]“扩张(为资本积累而扩大再生产)事实上成为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成为个人资本家生存的经济条件。”^[20]实际上,这就是资本的逻辑。然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不仅取决于生产过程,而且取决于流通过程中“代表新资本和新剩余价值的追加的

商品量必须得到实现,这就是说,转化为货币”。^[21]商品在流通环节必须被卖掉,顺利转化为货币,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才能实现,新的货币资本再投资进入下一轮生产中,如此不断扩大的周期循环,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增加市场需求或者扩大消费市场就成了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关键,资本家的目光必将朝向非资本主义世界。质言之,资本主义世界离不开非资本主义世界。资本积累“在一切方面是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形态的”,即“资本主义历史地生育并发达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之中”,^[22]并且“资本积累是在牺牲非资本主义阶层和国家的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和扩大的,它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把它们挤掉”。^[23]资本主义这种内在的张力和矛盾——既依赖非资本主义又不断消灭非资本主义,结局是“它必然要崩溃,……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出路,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以发展全球生产力,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24]这个阶段的特征是“资本积累的停顿”和“资本主义生产力扩大发展的停止”,“这就是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生命上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所表现的矛盾运动。”^[25]正因为如此,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发展,以及它们在争夺非资本主义地区中日益剧烈的竞争……它也就愈加迅速地挖掉资本积累自己的立足之地。帝国主义虽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它也是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26]

布哈林在其《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中指出,既可以“把帝国主义看作金融资本的政策”,也可以说“帝国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27]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是其固有的特征,积累是资本的增长,集中是单个资本的合并进而形成更大的资本,这必然导致垄断企业的出现。“资本家垄断组织的形成过程,是

资本积聚(累)与集中过程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延续。”^[28]“在自由竞争时代,只要以商品打进国外市场就够了,这种经济上的占领曾经使输出国的资本家感到心满意足,但是在现代,金融资本的利益首先要求扩张本国领土,也就是说,施行征服政策,采用军事压力,推行‘帝国主义的兼并’路线。”^[29]然而,重要的不是单个资本主义国家按照帝国主义政策行事,而是它们之间的竞争,即“作为更大范围资本主义竞争再生产的帝国主义”。因此,布哈林的论证“就从作为一种政策和一种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转移到作为世界经济一个特殊发展阶段的一种特征的帝国主义”^[30]在这个阶段,世界经济是各国资本的竞技场,而且竞争主要是以国家间地缘政治冲突的形式呈现出来。

列宁批判性地吸收了希法亭和卢森堡的理论,也在布哈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将帝国主义视作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给出了该阶段的五个特点。^[31]其中,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主要也是最本质的定义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32]列宁尽管认可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的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分析,但没有接受他的解决方法——重新分配收入,^[33]而是认为资本主义需要资本输出才能生存。这在国际体系中表现为“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而资本主义列强之间为此进行着“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34]至于使用“帝国主义”之名,列宁解释说:“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应当叫作帝国主义还是叫作金融资本阶段,是毫无意义的争论。”^[35]关键是不能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列宁批评考茨基“坚持对于作为原因的金融资本同作为结果的帝国主义的区分”^[36]这种区分使“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37]割裂帝国主义政治与经济必然导致将帝国主义视作一种资本主义政策,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经阶段,进而导致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倾向于改良主义。^[38]总之,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看来,帝国主义是指“主要资

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体现在以政治、军事、经济方式进行的争夺领土的冲突之中,并且最终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39]

(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和卡里尼克斯的超级大国帝国主义

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和列宁在分析他们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帝国主义概念及理论,用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揭示垄断资本主义的新趋势,并论证进入社会主义的合适路径。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之间,以及布哈林、列宁对他们的批评中可以看出,这些帝国主义概念及理论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解释存在局限性,列宁在布哈林基础上提出的帝国主义论在解释二战后资本主义新情况时也遇到了难题。从帝国主义理论对二战后国际关系历史和当代国际社会现实解释力的角度来说,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尽管当时只是一种预测,但却是一个相对有效的解释模型。

考茨基在《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再论我们的幻想》等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他对于帝国主义概念和帝国主义发展趋势的看法。其中,考茨基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第一,帝国主义概念:“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40]即帝国主义是一种工业国家征服和兼并农业地区的行为,它是一种对外经济政策。第二,帝国主义成因:当工业资本的发展超出了单一民族国家的范围后,“在国内没有足够的投资可能性或者只有低利润的投资可能性,这种资本就愈来愈力求在国外进行投资,但是,只有在那些由该资本家的本国所统治的地方,销售市场、原料来源和投资市场才是最为保险的。”^[41]第三,帝国主义特点:工业资本与财政资本相结合,同时财政资本国家化。商品输出有新的性质,要输出“在外国充作资本的生产资料”^[42]第四,帝国主义结局:帝国主义政

策会导致工业国内部的军备竞赛,而过度的穷兵黩武又会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以“帝国主义就这样……从发展资本主义的手段变成了阻碍资本主义的手段”。^[43]第五,帝国主义的特殊性:为了避免帝国主义最终毁灭资本主义世界,几大工业国有走向联合的可能性,即帝国主义政策可能被“超帝国主义”政策取代,暂时缓和“资本主义道义上的破产趋势”,“用国际上联合起来的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代替各国金融资本之间的相互斗争”。^[44]

考茨基将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政策的一种特殊类型”。^[45]在考虑国家间关系时,考茨基承认“工业民族国家”之间会因争夺新的农业区域而产生冲突,引发军备竞赛,最终爆发战争。但他认为,由于这样的战争劳民伤财,会损害经济垄断组织的利润,这时,“有远见的资本家”将在全球范围内联合起来抵制战争、推动裁军,反映在国际政治上便是一种“超帝国主义”阶段的来临,即“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说已经不再有任何事情妨碍用‘帝国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来代替帝国主义了”。^[46]那就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用和平协商、相互制衡、共同剥削世界代替相互间的掠夺性战争,形成一种新形势下的和平。

尽管超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可能暂时带来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一个新希望和新期待的时代”,^[47]但是超帝国主义仍然具有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性质,它只是帝国主义列强将彼此之间的冲突“转移到(对)世界剥削系统的维护上来”,并不意味着“中心国的被剥削人民和无产阶级将受到温和的对待”。^[48]考茨基要求人们警惕超帝国主义的欺骗性——“帝国主义对本国工人这样说,他们自己会从对殖民地工人弟兄的加紧剥削中得到好处”,这样说的目的是“以便使工人背弃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瓦解他们的国际团结”。所以,考茨基指出:“我们必须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激烈地反对超帝国主义。”^[49]列宁尽管批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但他也认为考茨基“不是替帝国主义辩护,而是

幻想‘和平的’资本主义”。^[50]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对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一种理论预测,它与卡里尼克斯的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后者是对二战结束到冷战终结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既有现象的分析。随着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成立,各国间尤其是西方国家间商品、资本、服务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以一种更加灵活与隐蔽的形式出现,即跨国资本主义与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处于美国领导下的超级大国帝国主义阶段。卡里尼克斯认为超级大国帝国主义体现为美国主导下的“开放帝国主义”——经济开放(保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开放(向国外传播民主和自由主义)。^[51]同时,在美苏争霸背景下出现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部分背离,如,美国支持西欧和日本战后经济重建、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没有导致其地缘政治冲突,这与经典帝国主义时期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往往彼此强化有根本区别。在此阶段,“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融合成一个单一的西方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换言之,曾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中紧密融合的“各国间经济(或资本)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出现了“部分分离”现象。^[52]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二战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空间上不断扩展,逐步走向全球化。

(三)新帝国主义:国际左翼理论界和戴维·哈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式各样的“新帝国主义”论陆续出现,其立论依据、理论内涵和政策主张各异,甚至彼此对立。虽然使用了帝国主义这一称谓,但绝大多数新帝国主义论已经偏离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仍然以资本的扩张为“原动力”来论证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性,进而认为“新帝国主义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新时代”的是国际左翼理论界。^[53]不过,国际左

翼学者尽管都普遍认同“新帝国主义不再追求表现为领土兼并和殖民征服的直接政治统治,而是注重经济控制的作用”,但是他们在有关“帝国主义发展的新形式或新阶段”——新帝国主义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上也同样各行其是,诸如,“新殖民主义”“金融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统治”或“价值帝国主义”等。不同于二战前的经典帝国主义论,新帝国主义的特征是:资本积累的权力——经济强制或经济剥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世界扩张的主导逻辑,对外暴力征服——领土兼并或殖民统治——不再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积累方式,但资本积累仍需要包括地缘政治控制和军事威慑力在内的“超经济强制”。“超经济强制与经济强制一起,共同构成了二战后霸权国家的资本主义实现全球统治的两种并列手段,经济强制是其中的主要手段。”^[54]这与戴维·哈维讨论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看起来异曲同工。

戴维·哈维批评美国近几十年采取的“新帝国主义”政策,并把它标签为“资本—帝国主义”。他从地理学的视角将资本主义扩张看作资本主义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扩散,认为资本—帝国主义是“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的结果,即“国家和帝国政治”与“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的矛盾混合。“国家和帝国政治”是“帝国主义行动者”的“一种特殊政治方案”,它们具有“指挥一方领土”并“运用该领土上的人文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权力;“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是指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过程”,通过在该过程中“控制和利用资本来取得领先地位”。^[55]

关于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关系,戴维·哈维指出,过去有关帝国主义的著述常常假定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简单的一致性”——“国家和帝国的战略引导着政治经济过程,国家和帝国常常遵从资本主义动机而运转。”实际上,两种逻辑之间经常是矛盾的、“相互频繁竞争”,甚至“完全对

立”,它们之间是“辩证关系”。在某个特定的历史—地理阶段,“两种逻辑中的某一种会起主导作用。”^[56]帝国主义就是从这两种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一方面,“由于资本的无限积累需要创造一个与之相应的政治—军事权力积累,它就在领土逻辑内部产生周期性的危机”;另一方面,“当政治控制在领土逻辑内部发生转变时,资本的流动也必须相应地发生转变以适应前者。”易言之,“每一种逻辑所产生的矛盾都必须为另一种逻辑所容纳”。^[57]由此可知,戴维·哈维的“两种逻辑”既借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本质属性的把握,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他们的帝国主义理论。因为“资本的无限积累和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是“持续不断地减少空间障碍的动力”,“改变空间关系”是“形塑政治重组”的必要条件,所以导致“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景观一直处于变动状态”。^[58]资本输出和劳动输出的长期结果是在新的地域空间“创造了新的动态积累中心”,这些“新的资本积累活跃地区”再通过地理扩张输出资本剩余。这一过程将出现两个可能的普遍性结果:其一是资本剩余顺利从一个空间输入到新空间,得到吸收;其二是“多个充满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在世界舞台上角逐”,引发“国家之间的对抗”——贸易战、货币战甚至军事冲突的危险。^[59]此时,资本—帝国主义霸权国必须应时而出,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够最好地统筹制度化安排,从而保持最有利于资本主义利益的国内和国际关系架构。

二、资本逻辑主导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

通过梳理帝国主义理论演进,我们发现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还是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冷战后新帝国主义,这些帝国主义理论尽管概念、理论框架、分析视角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共同揭示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

其一,资本追求自身积累或增殖最大化的属性和主导地位没有改变。希法亭的“(金融资

本)对扩张的需求”、卢森堡的“为资本积累而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中“资本的无限积累和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这些论述对资本积累或增殖属性和主导地位的认识是一致的,即使它们处于帝国主义发展史的“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戴维·哈维评论说,马克思所称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应改称为“剥夺性积累”,因为这种积累是“建立在掠夺、欺骗和暴力基础之上”。^[60]而在新帝国主义阶段,这种剥夺性积累本质上未变、范围上更广、形式上更多样。新帝国主义与旧帝国主义一样“具有简单掠夺的原罪”。^[61]因此,冷战后新帝国主义时期,基于民族资本对外扩张的列强间对抗表面上已经缓和,但是资本增殖、积累和剥削劳动的基本逻辑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全球资本扩张不会停止,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是从主要的殖民扩张转变为经济扩张和剥削。”^[62]

其二,垄断依然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主要特征。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垄断,垄断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积累最大化的最便捷方式,为资本积累而采取的不同垄断形式使帝国主义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特征。19世纪后期的德国和美国,金融资本巨大的集中力量及其对产业的控制力推动了企业间的联合——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达到了资本主义对经济的组织化”。^[63]在冷战后新帝国主义阶段,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金融或产业资本控制着全球或区域范围内特定产业或市场的多数份额,资本国际化过程中形成的“跨国寡头垄断”体系,为“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劳工套利”提供了便利,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从南方国家榨取更多的“帝国主义租金”(imperial rent)。^[64]戴维·哈维也指出:“当代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下通过金融力量强迫发展中国家将以前抵制资本逻辑的领域私有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来解决(发达资本主义)自身的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65]在现今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往靠直接占有殖民地才能获得

的利益,现在只需资本流动自由化就能获取。

其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迄今,人类社会就本质而言依然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与现代主权民族国家国际政治体系”中,^[66]“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和主权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67]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积累的逻辑与帝国主义体系中国家政治管理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即“全球化生产力与霸权主义世界格局之间的矛盾”。^[68]“帝国主义理论主要研究资本积累过程中国家与资本以及国家之间在特定国际环境下的矛盾运动。”^[69]换言之,帝国主义主要是分析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它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试图走出自身危机而采取的内外政策及其背后的行动逻辑。布哈林详细论证了垄断资本主义构成的世界经济格局,并且分析了这个格局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资本的“国际化”和“民族化”,即资本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界流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使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它又被各个民族国家所阻隔,分裂为“经济利益相矛盾的‘民族’集团”。资本的“国际化”和“民族化”既结合在一起,又彼此激烈冲突,推动着帝国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70]布哈林指出,国家政权在帝国主义时期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最大股东”“最高司令部”“捍卫者和保护者”,“拥有惊人的巨大权力”。^[71]国际左翼理论界的“超经济强制与经济强制”和戴维·哈维的“权力的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逻辑”也是沿着这一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矛盾的主线来揭示新帝国主义实质的。

其四,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各个阶段,包括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私有属性没有改变。掌握或拥有资本的个人、组织或国家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其中包括意识形态利益诉求,换言之,资本积累或增殖的逻辑必须符合资本所有者的利益

诉求,受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支配。资本积累或增殖——财富创造的逻辑是如此,财富分配的逻辑或规则也是如此。为了更多地占有和支配资本、财富或利益,各国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在国内外加紧扩张,尤其是在国际层面,垄断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全球资源及空间有限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全球性危机的爆发也越来越频繁。对此,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尤其是冷战后的世界历史提供了无数例证,这一进程的真正主导者和受益者是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垄断资本。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国内确立了有利于垄断资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为主要的企业家和银行家提供舒适的环境”,而且作为垄断资本的利益代表“为利益集团提供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活动的环境”,^[72]在国际层面极力建立和维护有利于各自垄断资本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当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被极少数资本寡头或集团所垄断、利益分配严重失衡时,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将面临各种乱象和危机,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也将陷入困境。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展开竞争和对外转嫁危机,国际局势将动荡不宁。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推动的结果。在当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它“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式”——“生产和资本的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的少数资本集团占有的矛盾”,而生产资料被西方少数资本集团占有就决定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规则“代表的不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普通公民的利益,而是代表大公司和金融集团的利益”,易言之,“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实现在资本增殖而非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从财富分配视角看,“在资本主义的资源分配逻辑下,全世界的生产活动主要是满足地球上最富裕阶层的物质(和精神)需求。”^[73]质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才是导致当今西方国家内外困境的根本原因。从国际层面来看,主要资本集团及

其背后的国家间利益冲突才是当今国际局势动荡的根源,所谓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对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仅仅是吸引眼球的表面解释。

综上,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一方面,资本的积累和增殖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世界经济整体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权力凭借强大的地缘政治支配能力,形塑了全球的地缘政治和空间构型”,^[7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规制和主导着全球化进程,它们竞相追逐最大化自身利益——名之为国家利益的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确定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帝国主义安排。“历史主体逐渐异化为资本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75]背离了人类社会应有的发展趋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其中拥有强势地位和话语权,导致国际关系中产生“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76]当前,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找到一条超越资本逻辑和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路径。

三、公共性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从人的自由和发展这一维度来考察和分析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77]由于人固有的社会性存在属性,因而人类社会共同体中有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区别,“(私人利益)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78]“私人利益为了实现自身,就必须首先满足其他私人利益的实现,各个私人利益在相互实现中创造了一个公共利益、普遍利益。从这个角度说,公共利益的产生是私人利益相互实现的结果。”进一步来说,“公共利益就存在于私人利益相互实现的共同领域中,既是对所有私人利益的限制,也是对所有私人利益实现的保障。”然而,“私人利益在相互实现中并不会自发地产生

和维护公共利益,……公共利益需要一定的社会共同体来(维护和)实现。”^[79]质言之,公共利益依附于一定形式的社会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则代表和实现了一定的社会公共利益。

“马克思更为关注的是一种共同体形式到底为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条件。”^[80]在马克思看来,“共同体指的是由人组成的群体,它可以指家庭、氏族、部落、社区、社群,又可以指国家乃至超国家的人群集合体。”^[81]人类社会共同体经历了早期“自然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虚幻的共同体”到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共同体”几个发展阶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共同体”阶段,由于生产力低下、公共领域问题相对简单,以及人自我意识的匮乏,人们依赖于共同体而存在,相互之间利益高度一致,彼此间的交往联系大多仅限于共同体内部。随着个体独立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具备了与共同体相分离的条件,“自然的共同体”必定走向解体,即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自然的共同体”逐步走向以物的依赖关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虚幻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之所以是“虚幻虚假的”,是因为它表面上以“国家”的形式和“民主”的方式来捍卫和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实际上是将资本家的“特殊利益”上升为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和“普遍利益”,^[82]国家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维护和调节资本家的私人利益。“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83]在这个阶段,“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84]这种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共同体是同广大被统治阶级的自由发展相对立的,他们由于获取生活资料的需要不得不服从资本对自己的强制,成为资本主义共同体锁链上的一环。因此,必须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虚幻的共同体”,努力引导人类社会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5]

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和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核心,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引。人类社会的公共性维度和实现程度反映了社会和人的自由发展程度。“公共性,即可共享性,是相对于自利性(私人性)而言的。自利性,简单地说就是排他性、独占性。”^[86]公共性的载体是共同体,公共性的价值取向是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公共性的发展以共同体的发展为基础。按照唯物史观的分析,公共性本身就是共同体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一个社会的公共性水平与社会产品的总量及其分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各民族的交往范围和程度、个人或社会的自由时间密切关联,社会产品总量越多、分配越公正,人对自然开发利用越是合理和可持续,各民族交往范围越广、交往程度越高,个人或社会的自由时间越多,社会公共性水平就不断提升,这是一种客观趋势。但是,由于“资本的本性是私人性”,“(尽管)其私人性的实现离不开公共性,(但)私人性和公共性的矛盾构成了资本的内在矛盾。”^[87]资本的逻辑只在增加社会产品总量、扩大各民族交往范围和程度、提高个人和社会自由时间这些方面符合提升社会公共性水平的客观要求,但在分配制度、资本的历史主体地位、人与自然关系、资本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方面则阻碍和限制了社会公共性的发展。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资本逻辑的公共性效应并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

首先,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分配制度使资本所有者和统治阶级最大化地获取价值增殖的利益,资本主义社会被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所主导,历史主体逐渐异化为资本以及拥有资本的利益集团和统治集团,消解了人的历史主体性地位,背离了人的自由发展这一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趋势。换言之,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人类社会的公共性发展方向存在冲突。

其次,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资源为特征,伴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来的是生态和环境危机,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这些问题在本质上都是社会公共性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以牺牲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满足少数国家和少数群体的利益。从全球层面来说,有关代际公平、可持续发展、南北协调发展等全球治理议题也是全球公共性问题。

最后,资本逻辑主导和推动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无法适应人类社会公共性发展需要,资本逻辑不断扩大和巩固资本统治劳动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交换制度,不断增加发达国家和资本集团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控制力及话语权。一言以蔽之,现代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本质上是一种被资本霸权控制的体系,这一体系违背人类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必须探索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公共性且有助于解决全球问题的国际体系和共同体实践模式。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来看,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是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呈现出来的,没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资本本性是不可能得到逻辑展开的。”^[88]马克思在归纳资本主义生产(资本逻辑)的历史趋势时指出:“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89]希法亭在分析帝国主义发展趋势时也指出,“金融资本在组织上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前提,它也在政治上使过渡更容易进行”——“金融巨头的独裁统治将最终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90]质言之,资本逻辑具有自我扬弃的演化趋势。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资本具有“文明”的一面,即资本发挥着“资金融通与资源配置的功能性作用,实现全球经济繁荣”;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资本服务于重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即资本需

要持续的全球空间政治性重构来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霸权和强权国家的整体利益。因此,在“资本逻辑尚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前,“要利用资本走向自我否定的规律,对(其)加以引导和规制,克服其自身的不可持续性和不稳定性,在辩证扬弃的基础上实现全球化的转型重塑。”当然,彻底扬弃资本的逻辑要等到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通过实现对资本的社会性占有和公共性支配,消灭私有制,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世界利益统一为全人类福祉。资本自我扬弃的过程同时也是“带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的制度理念或要素形式”不断萌芽和发展的过程。^[91]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种性质的理念,它与马克思构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在应然层面具有逻辑一致性,即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某种程度上是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中间过渡形态和实践。“由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起来的全球生产力与各国人民的普遍联系,则为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积累条件。”^[92]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93]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公共价值的追求,反映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从对抗走向合作、从社会革命走向全球治理的公共性价值选择。^[94]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应对人类共同挑战而被倡导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状态。”^[95]“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人是历史主体的时代重置,是对资本宰制下历史主体的根本超越。”^[96]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各国公共利益和规范资本逻辑运行需要的一种人类社会公共性实践,它要求把维护和发扬人类公共价值内嵌于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之中。在国际体系

的设计和运行中,发挥共同体公共性逻辑的主导作用,以公共价值来引领和示范,为建立公平正义、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奠定基础,以人类共同命运为公共价值和全球治理理念,努力构建各国普惠、公平、平等的国际秩序。

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原则,其内在逻辑体现为对话协商、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公共性逻辑,与资本的单一主体性逻辑——积累和增殖——根本不同,尽管资本逻辑为现代社会公共性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超越资本的单一主体性逻辑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趋势。实践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和长远发展,凭借‘以人类为本’的价值立场和‘互利共赢’的目标理念,实现了对金融资本内在的资本逻辑及作为其制度理念的新自由主义体系的扬弃和超越,从而指引金融资本全球化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97]

再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在充分利用资本增殖逻辑的同时,让资本成为实现劳动者自由和个性发展的手段。易言之,让资本增殖的逻辑服务于增进和实现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性,以共同体公共性逻辑来超越资本逻辑的主导地位。理论上,资本逻辑的式微和共同体公共性逻辑的增强不仅是解决当前全球治理问题的出路,而且也是人类迈向更高社会形态的需要。人类社会需要不断摆脱资本主体性逻辑的统治和制约,不断提升和发展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直到资本主体性逻辑的使命完成,实现《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财产”,^[98]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一个新的“自由人联合体”。

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构建一个多极、平衡、公正的全球秩序。为此,必须立足人类共同体的需求和价值立场,以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原则约束资本逻辑对全球公共性的侵蚀,破解资本增殖逻辑带来的全球治理困境,尤其是国际

政治经济秩序“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格局,引导资本更好地完成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全球公共事务由大家共同商量,和平发展与公正有序的世界体系由大家共同建设,全球治理体系创造的发展红利由大家共同分享,由此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性超越。”^[99]

五、结 语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史遵循着连续性和变化性之间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分析自然也体现了“连续性与变化性之间的关系”。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正是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政策或意识形态。垄断资本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它只会依据自己的本性行事,不断进行资本积累与增殖。它将不可避免地越过单一国家的界限,发展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决定和影响整个国际秩序。从经典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到冷战后新帝国主义,资本积累和增殖的逻辑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资本全球积累的固有特征没有变化——“帝国主义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借助各式各样的剥削和剥夺来实现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100]“全球化加速强化而不是削弱或消除了世界经济的帝国主义结构。”^[101]“西方资本家阶级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仍在持续,世界秩序似乎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翻版”。^[102]“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凸显,由资本主义开启的全球化时代正展开前所未有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超越和规制资本逻辑及其确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成为当务之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当下解决全球治理困境和实现全球空间公平正义的理念和方案,它立足于人类共同体的公共性价值立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103]引导资本更充分地发挥丰富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历史使命,以共同体公共性逻辑超越资本增殖的逻辑,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构建一个多极、平衡、公正的全球秩序,

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维护共同体公共利益为基础,以彰显共同体公共性为价值取向,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

注释:

[1][76][10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79][86]郭湛:《公共性哲学——人的共同体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5、39-40、7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4页。

[5][7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6][15][51] Alex Callinicos, *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pp. vi, 175-178, 25-26, 96.

[7][69]谢富胜:《当代帝国主义研究的三种范式》,《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

[8][75][80][96]秦龙、赵永帅:《从马克思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逻辑与实践图景》,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34、196、11、196页。

[9]周芬、张顺洪:《帝国和帝国主义概念辨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

[10][27][28][29][70][71][苏]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蒯兆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86、84、43、56-57、80、96-101页。

[11][52][英]亚历克斯·卡里尼克:《冷战结束以来的帝国主义论评析》,李春兰、杨柳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1期。

[12][55][56][57][58][59][60][61][英]戴维·哈维:《新帝国主义》,付克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7-18、17-18、18-20、108、58-59、69、85、105页。

[13][加拿大]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4页。

[14][37]《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4页。

[16][17][90][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53、385-387、426-430页。

[18][36][40][41][43][44][45][46][47][49][德]卡

尔·考茨基:《帝国主义》,史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第26、26、2、18、17、35-36、26、16-18、37、18页。

[19]张梧:《罗莎·卢森堡范式:从帝国主义到全球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20][21][22][24][25][26][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9、13、289-290、376、333、359页。

[23][德]罗莎·卢森堡、[苏]尼·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柴金如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9页。

[30][39][48][英]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一个批判性的考察》,陆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112、91、132页。

[31]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列宁在其笔记原稿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提纲”中有专门说明,指出“大体上:‘现代(最新的、最新阶段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在“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提纲中也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现代)阶段”。据此,我们认为,按照列宁的笔记原稿,似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是更合适更准确的书名。正如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参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02、239页。英国学者肯尼思·塔巴克(Kenneth J. Tarback)1972年编选并出版了卢森堡1915年写的《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和布哈林1924年写的《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的英文版,并在书中写了一个长篇序言,塔巴克指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采取的做法是,把列宁这本书(由于其书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说成是一种对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描述,但是列宁在其原稿中并不想把他概述的发展阶段当作对资本主义的最后断语。See Kenneth J. Tarback, ed.,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72, Preface.

[32][34][35]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6、122、90页。

[33]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应该是第一个使用并探讨近代帝国主义概念的人,对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影响很大。1902年,霍布森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A Study*)一书出版。书中认为,国内消费不足是产生帝国主义的原因,解决的办法是重新分配收入来刺激国内消费、消除生产过剩,那么国家就没有必要争夺海外市场和对外扩张了。参见[英]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帝国主义》,卢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2-84页。

[38]有学者认为,列宁并未从理论上彻底否定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的未来可能,只是出于动员无产阶级革命的紧迫性需要,在列宁看来,谈论这个抽象的未来,思想上非常有害。参见陈人江:《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本质内涵与问题意识辨析——兼评国际左翼的帝国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7期。

- [42][德]卡尔·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何疆、王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20页。
- [50][苏]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列宁序言”。
- [53]李玉峰:《“新帝国主义论”研究综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
- [54]陈人江:《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本质内涵与问题意识辨析——兼评国际左翼的帝国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7期。
- [62]尚伟:《布哈林帝国主义论解析及其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0期。
- [63]《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第221页。
- [64]帝国主义租金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帝国主义资本剥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而获得的收入;二是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及其他相关主权利益。参见[美]约翰·福斯特等:《全球劳动后备军与新帝国主义》,张慧鹏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6期。
- [65]段忠桥:《资本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霸权——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 [66]叶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述析论——兼谈其对新时代认识和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启示》,《学术界》2018年第10期。
- [67]叶江:《从现代世界体系发展演变探析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走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径》,《学术界》2020年第11期。
- [68][92]鲁品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当代国际基本矛盾的中国方案》,《学术界》2019年第6期。
- [72][美]哈里·马格多夫:《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孙业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86页。
- [73]谢长安:《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当代困境及其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 [74]夏银平、何衍林:《从资本逻辑到以人为本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空间的伦理重塑》,《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8期。
-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 [81]袁吉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辨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 [82]梅景辉、骆祥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三重逻辑及当代价值》,《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 [8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5页。
- [8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 [85][9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1、43页。
- [87]桑明旭:《马克思的公共性范式变革及其当代启示》,《理论探索》2019年第5期。
- [88]张雷声:《论资本逻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 <https://www.dswxyjy.org.cn/nl/2019/0617/c427160-31163051.html>。
- [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5页。
- [91][97]刘洋:《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超越——基于马克思主义逻辑批判的视角》,《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7期。
- [93]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 [94]张晓:《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74页。
- [95]孙来斌:《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
- [99]徐艳玲、李文勇:《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破”与“立”——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为线索》,《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 [100][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晚期帝国主义——写于哈里·麦格道夫的〈帝国主义时代〉出版50周年之际》,张志超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1期。
- [101]牛田盛:《晚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历史终点》,《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 [102][英]克里斯·哈曼:《解析帝国主义(上)》,王宏伟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刘姝媛]